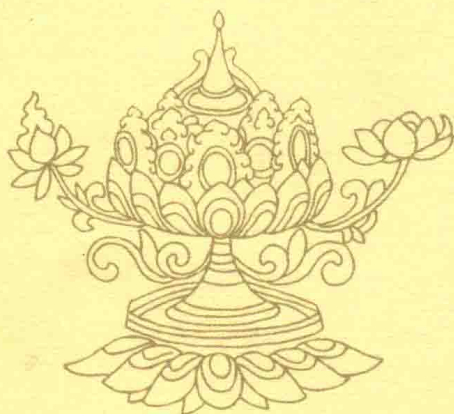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西部美术考古史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出版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西部美术考古史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美术考古史 / 罗宏才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9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ISBN 978-7-5671-1840-9

I. ①西… II. ①罗… III. ①美术考古-考古学史-研究-西北地区 ②美术考古-考古学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87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811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西部美术考古史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5.5 字数 600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840-9/K · 135 定价: 72.00 元

序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罗宏才教授主编的“西部美术考古丛书”即将问世，要我写一篇总序，尽管我近日非常忙碌，身体还有些不适，还是答应下来，这固然是因为罗宏才教授出身西北大学，与我颇有渊源，但更主要的是我深觉这部丛书的立意甚好，符合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向。至于我能否体会丛书的宗旨，也就在所不计了。

我想分三个层次来说，首先是西部考古，然后是美术考古，最后再试谈西部美术考古作为学术前沿的地位。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开始传到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不少外国学者及所谓探险家曾进入中国西部。在此刺激之下，中国有关学术界也对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给予特殊的关切。然而在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工作开展之后，更多的注意是集中在作为古代王朝核心的中原一带，对广大西部的探究相对说来要少些，有大量没有解决的课题存留至今。

实际上，西部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说的，周秦汉唐的发展过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长达八百年的周朝而论，其早年的兴起，正是背靠西北，继之而来的秦人也走着类似的道路。不深入考索西部的文化，便谈不上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貌，而由于传世文献内容的限制，这方面研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于考古学。

美术考古则是当前中国考古学急待进一步促进发展的部分。从学科的去历史来看，中国的考古学和西方的考古学本来有着先天的一些差异。如很多考古学史的专家所指出的，发轫于19世纪早期的西方考古学，原系自欧洲传统的古物学演变而成，而后者从来是和美术的鉴赏和论析相结合的。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的，则是源远流长的金石学，其成形为一门学问，至少可追溯到北宋，而金石学的特点是以“证经补史”为职志，最重视有



文字的遗物,以至同专研文字的所谓小学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始终与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彼此配合,恰如夏鼐先生所形容,似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成为认识古代的必要途径,是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的。

然而,我们想有更大的进步,还应该学习西方考古学校我们优长之处,其中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要重视与美术史的结合。比如我们自己是研究古代青铜器的,常说考察青铜器当有五个方面,即:形制、纹饰、文字、功能和工艺,现在想来一定要加上一点:青铜器的美术性质,这样我们的研究便更臻于全面。这个例子不一定妥当,但似足以例其他。

近年,已有一些学者在推广美术考古方向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使我回忆起山东大学已故的刘敦愿先生。刘先生一生为振兴中国的美术考古反复呼吁,功绩卓著。收录1998年出版的《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的他的《传略》说:美术考古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科研领域,要搞美术考古的研究,必须既具备考古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备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刘敦愿先生对此寄以厚望,他如果得知今天这方面的进展,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罢。

中国西部的历史条件与中原等地区不同,不仅保存着地下地上大量的美术品,而且是与境外文化交流沟通的必经通道,从而美术考古,特别是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美术考古,在此有着十分广阔的用武之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有其自己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然而其进程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境外文化的接触,主要的路径是通过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所谓“丝绸之路”的原始,很可能应大为上溯,其间蕴藏着许多奥秘,有待大家来开发。

“丝绸之路”的研究,现在已经从根本观点上拓展了,这个观点是把欧亚大陆看做一个整体。以这样的观点作为基础,形成了20世纪后期逐渐推广的欧亚学。欧亚学的刊物和著述,在外国已有不少,国内如《欧亚学刊》也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假如我们把中国的西部考古,尤其是西部美术考古,同欧亚学的探究适当地配合起来,我认为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新成果。

翻阅“西部美术考古丛书”第一种《从中亚到长安》所收论文,已可看到各位学者都在努力拓广自己的眼界,采用最新的方法,再看丛书今后各种拟议中的目录,更足见主编罗宏才教授的志向。谨趁此机会,祝愿这部富于学术价值的丛书取得预期的成功。

李学勤

2011年9月19日
于北京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西部美术考古发展史述论

- | | | |
|-----|---------------------|-----|
| 第一节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西部美术考古 | 8 |
| 第二节 | 1919—1928年的西部美术考古 | 35 |
| 第三节 | 1928—1949年的西部美术考古 | 55 |
| 第四节 | 区域美术考古历史的观察结论 | 155 |

第二章 途径与方法

- | | | |
|-----|--------------|-----|
| 第一节 | 收藏著述与西部美术考古 | 161 |
| 第二节 | 美术考古元素的提取与利用 | 200 |

第三章 区域与主题

- | | | |
|-----|------------------------|-----|
| 第一节 | 唐昭陵六骏位序、蓝本、仿绘、仿刻、拓本与模制 | 241 |
| 第二节 | 唐会王墓志引发的几个问题 | 303 |
| 第三节 | 美术考古实践案例 | 327 |



第四章 自由与规制

第一节	大夏石马的若干问题	375
第二节	唐景云钟的规制与衍化	426
第三节	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	469

第五章 流传与递变

第一节	乾元庵石刻调查保护史略	505
第二节	西安东岳庙调查保护史略	514
第三节	1936年前延安清凉山石窟调查保护史略	533



第一章

西部美术考古发展史述论



根基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美术考古学在复杂历史进程中不断兼容并蓄其他相关学科的人文精华,戮力碰撞衍生并持续施行一系列有意味的融会贯通,完成了诸多具有探索意义的工作实践,开拓出广阔的研究领域,磨砺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途径与方法,展现出独特的学术魅力。随着学术进步、社会革新趋势的进一步增强,相信其鲜明工作特色与丰富工作内涵,还将进一步得到扩充与提升。

追寻美术考古学发展历史,考究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斯(Adolf Michaelis, 1835—1910)发端“美术考古学”^[1]名词的内涵与初衷,检讨中国美术考古的缘起及发展历史,评述其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同语境下名词转换之正误、得失,聚焦其学科义理之辨析与校正,探索其发展路径与时代背景,观察、评判其学科属性,分析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总结其理念、方法,指出其客观存在的诸多不足与缺陷,探索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与前景……以往的研究者辛勤耕耘,先后有不少的论述与争议,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2]。

本章的讨论,无意涉及此前已至的研究境界,根基曾长期工作于陕西一

[1] [德]阿道夫米海里斯著,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1929年郭沫若据[日]滨田耕作日译本译为中文本,并在同年7月5日由上海乐群出版社出版,称《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氏中译本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时易名《美术考古一世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再版此书时,即依此本。

[2] 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主要有:杨泓的《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及《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朋川的《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装饰》2001年第5期);刘凤君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熊永强的《试谈中国美术考古学——兼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作者商榷》(《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倪志云的《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版);刘敦愿的《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邵学海的《“美术考古学”之名辨》(《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郑岩的《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刘允东的《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兼论美术史边界的泛化》(《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邵学海的《“天下之是非”焉能混同“人人之是非”——为“美术考古学”定义与郑岩先生商榷》(《美术研究》2010年第4期)等。



隅的考古工作经历,笔者颇有兴趣关注19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发展”^[1]时期,期望考察由此开始至少近百年来西部地区相关美术考古历史的发展、变化轨迹,搜集整理经久湮没的相关文献与实物资料,探索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与相应的方法与理念,总结其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汲取其客观存储的智慧成果因子,使之能够有效裨益学科历史的相对完整集结与充分展现。

需要说明的是,现今学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分野,对位亚欧大陆东部,包括中国整个西南与西北地区。而本章的研究主题,设定为“西部美术考古发展史述论”,但涉及区域却主要是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及其他相关地区。资料的搜集时限,暂定在2015年6月以前;讨论的时代区间,肇始于鸦片战争发生后的19世纪后半叶,终结于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考虑到一些讨论主题的特殊需求,部分时段与研究区间将适当予以提前或延伸。

历史视阈里,上述设定的主体研究区域,被称之为“丝绸之路”。是“一个”被英籍德裔东方学家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s Rudolf Hoernle, 1841—1918)视作“充满着考古学奇迹的地区”^[2](图1-1),承载过漫长的历史风华,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总体来说,其“文化流布的途程,站在西陲方面来看”,存在着“从西南向东北进展”^[3]的规律(图1-2、图1-3)。作为代表性资源中心之敦煌莫高窟,尤为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艳羨,称其“洞中壁画雕刻之富,冠绝东方”^[4]。因之也就成为美术考古萌芽与初创阶段的重要温床及实践场所。而在美术考古学研究视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40年代,又是其充分融合中西学术精华,有效集约发展,不断鼎新的重要历史时期。

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该设定非但不影响从广义、狭义两种维度对“西部地区美术考古发展史”概念的理解与认定,反而会使相关研究具有更集中、更准确的观察区域,获取更直接、更生动的观察案例,从而得到更真实、更完整的学术感受(图1-4)。这对于深入了解美术考古学渊源、背景及

[1] 引自德国亚洲艺术史研究专家、欧金尼奥·巴尔赞奖获得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对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评语。

[2] A. F. R. Hoernle, 'Annual Address, 1898',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p. 62—70. 参见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载《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3] 滕固:《西陲的艺术》,原载《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1卷,第7~8期;收入《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另见滕固著、沈宁编:《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26页。

[4] 王国维:《海宁王忠愍公遗书》,1927年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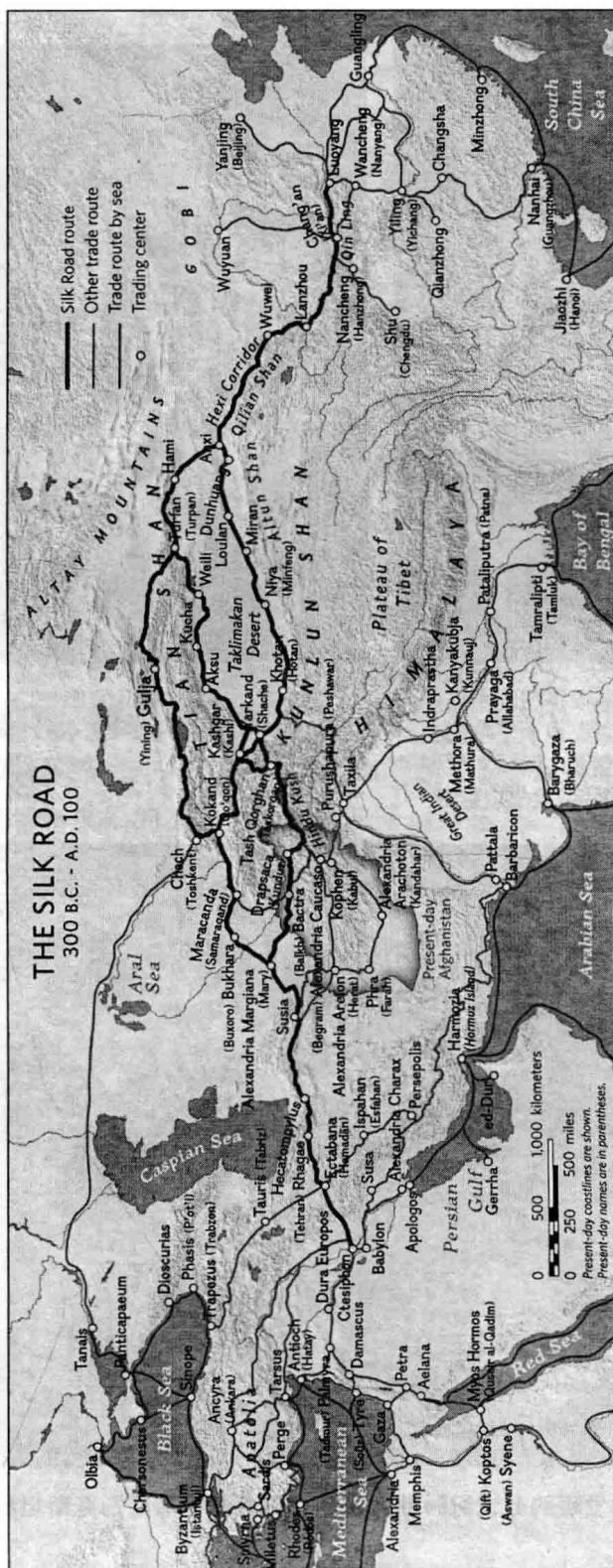


图 1-1 丝绸之路主要区段地图





图1-2 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壁画局部
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采自天木(数字)历史博物馆



图1-3 [英]斯坦因(1862—1943)
采自1998年版《敦煌学大辞典》



图1-4 撒马尔罕发现约七世纪时期大唐公主荡舟图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博物馆藏



发展演变轨迹,裨益当今学术需求,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当然,聚焦主题与历史,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事件与重要实践,以及其他时段相关西部美术考古发展历史的一些史实、文献,本章在叙述中也将适当予以穿插、补充及局部考述。

由是,对位“西部美术考古发展史述论”研究主题,本章将围绕以下工作阶次进行叙述:

-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西部美术考古;
- (2) 1919—1928年的西部美术考古;
- (3) 1928—1949年的西部美术考古。

诚悬而言,限于学力、资料、视阈、场域及研究基础的空白,本章的讨论,仅只是初阶意义上的梳理与探索,系统建构,困难较大。目前的收获,仅呈现大致的轮廓,一些议论层面与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美术学等相关学科之间,还存一定的模糊混接与史实杂糅,遽然之间,难以有效分离。至于学科的有效区隔、资料的科学分类以及推进的秩序性史线勾勒,尚显粗糙并时见破碎、跳跃。初步构结的所谓“发展史”,根基浅显,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谬误;求取系统完整与准确、科学,尚待新资料、新理论以及更多有志此一课题研究者新成果的不断参入来逐步予以净化、提升。



第一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西部美术考古

中国近代史纲要阐明,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急剧改变,发生在文化体系方面的革新、裂变亦随之加剧。

裂变的具体标志,可以选取1859年《中英天津条约》(图1-1-1)、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以及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相继签订这三个历史门槛。

资料显示,《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人士在中国内地的“游历及传教”^[1],由是成为一种事实与特权。至《中英烟台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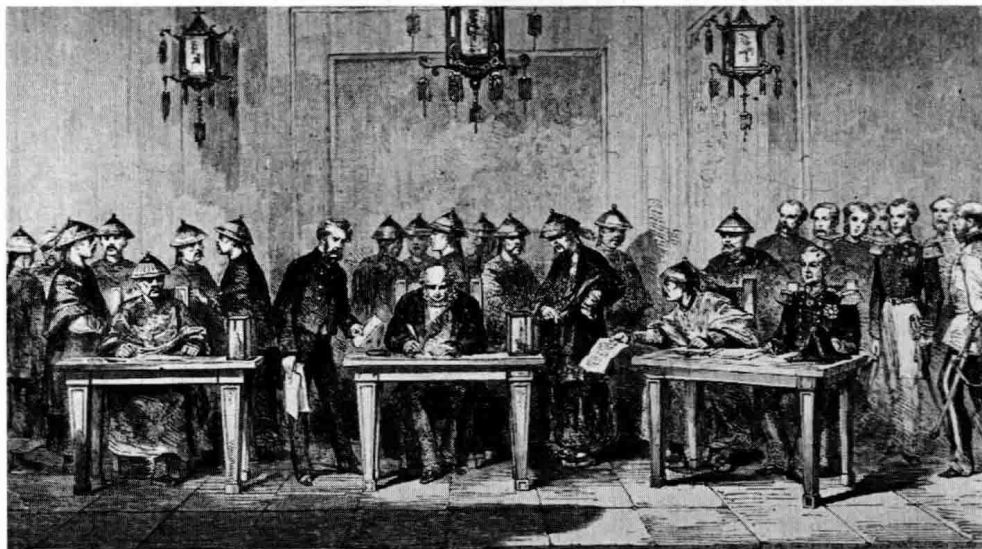


图1-1-1 《中英天津条约》签约现场
采自《伦敦新闻画报》1858年10月22日

[1] 如1859年《中英天津条约》:“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条约第七款明定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及建造自便。”

“另议专条”^[1]签订，英国更从此获得派遣探险队自北京经甘、青、川等地入藏，或由印度直接进藏的所谓“条约权利”^[2]。及此，中国主权遍体鳞伤，西部地区门户随之洞开。

毋庸置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强制注入，造成对中国国家主权与民族权益的伤害与破坏，同时并直接伤及中国西部地区文化资源构体本身，导致文物艺术品原在环境和原有形态的错位与改变，带来大量珍贵文化艺术品的凄然流散与学理层面意义上的组群破裂及链条闪断，甚至还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动摇与变更。

这样的野蛮举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危害，连跻身欧洲人考察西部地区之列、姗姗来迟的日本学者野村荣三郎也愤愤不平。在1908年12月1日的考察日记中，野村荣三郎以复杂心态，不无埋怨地记道：“这些自命为文明国家学者的欧洲人，把世界至宝作为私有物的心理可以说比盗贼还要卑劣。”^[3]（图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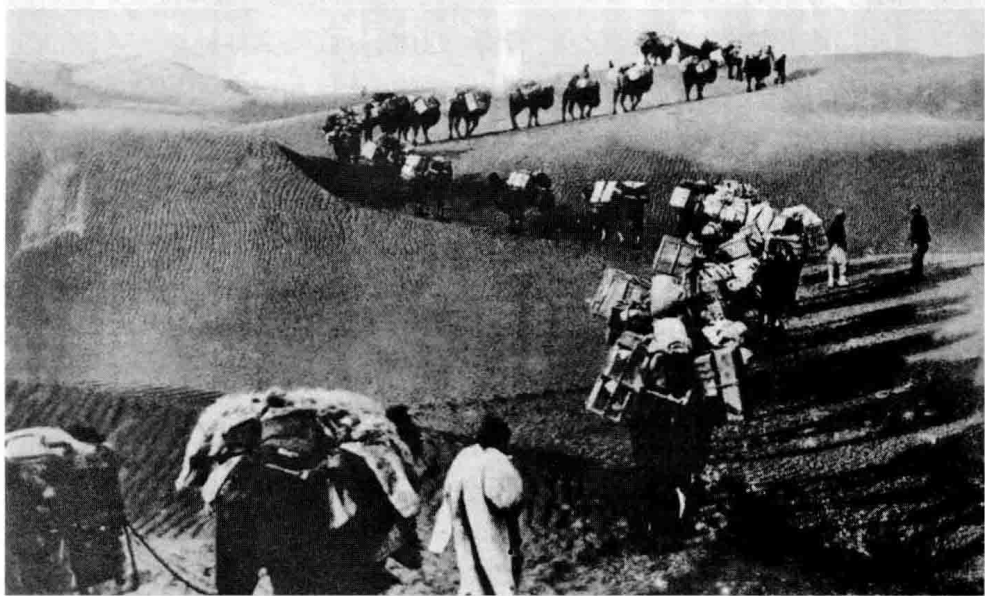


图1-1-2 有野村荣三郎参加、满载于西部地区考察中所获文物的日本大谷考察队行进在沙漠中
采自“人民艺术网”2015年8月6日

[1] 《中英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中英会议条款》，分三部分16款，并附“另议专条”。

[2] 参见“凤凰网”《中英烟台条约》。

[3] [日] 野村荣三郎著，董炳月译：《西域探险考察大系：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痛定思痛,这一时期的所谓“游历”,带给我们的集中思考与鲜明视点,至少有如下三个:

一是随着时间推移与历史背景的变幻,“游历”一项快速上升至名称各异、目的却大致相同的“考察”、“探险”等活动。

二是考察、探险的主体区域,由初期的散漫、局促,快速转向文化资源蕴藏丰富、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

三是考察、探险的直接目标与最终“成果”,主要是对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疯狂掠夺与肆意破坏。

契合三个关键视点,具有初阶美术考古意味的探索实践亦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悄然萌动。

对位西部地区,这种探索实践大致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探索实践群体以欧洲人为主、日本人为辅。欧洲人系列中,包括英、法、俄、德诸国,其中又以英、俄两国目的基本相同的“大角逐”(big game)^[1]争夺为著。考察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当时被列强称之为“未知地区”的新疆地区。相应涉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云南等其他地区。考察的对象,主要是石窟寺、古城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民居以及考察可能目及的青铜器、陶瓷、石刻、雕塑、书画等相关文物艺术品。基本囊括了这一区域的全部文化资源内涵。

其中新疆地区主要考察对象是石窟寺、古城遗址,西南地区则主要是汉代崖墓、石阙及佛教文化遗迹。

前文提示,与其他国家考察者区别,英、俄两国在新疆地区的“大角逐”,源自其殖民地扩张的野心驱使^[2],争夺劫掠的文物艺术品主题,是以“古文书”为主体的古文献实物资料,尤以俄国最为活跃。不过稍逊一筹的英国并不甘示弱,声称“大不列颠将不会落后于其他国家,将会分享这些奇迹中的应得到的份额”^[3]。

诸种考察中,以1907年开始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图1-1-3)等人对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

[1] 贾建飞:《清人视野中的英俄中亚“大角逐”》,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 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参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3] A. F. R. Hoernle, 'Annual Address, 1898',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p. 62—70. 参见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载《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